

清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粮价波动研究

罗畅¹ 杨建庭² 马建华²

(1.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2. 山西大学,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 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九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发现: 乾隆晚期, 清朝政局较为稳定, 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短期的自然灾害与战争。特别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先旱后涝、乾隆五十年(1795)的大旱造成了粮价的急剧上涨, 台湾的林爽文起义也造成了粮价的短期上涨。乾隆晚期的粮价总体上稳中有降,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粮食连年丰收和国内较为安定, 外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期间, 运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减少。研究表明, 当时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内部以及中下游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整合的市场。

关键词: 清代 粮价波动 市场整合 乾隆晚期 长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8)12-163-168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清代长江流域粮价波动的探讨, 当以全汉昇先生为嚆矢。薛华(Carol Hua Shiue)分别使用 1723-1735 年和 1742-1795 年的粮价数据和粮食收成数据, 对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和贵州共 10 个省 121 个府州的市场整合状况进行定量研究, 并探讨了赈灾在熨平粮食价格波动中的作用。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主要考察乾隆四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1778-1795)长江流域的米价波动及市场整合情况。

二、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的粮价波动

本文选取长江流域各省主要的粮食流通枢纽: 成都、重庆、汉口、长沙、安庆、南昌、苏州、杭州、江宁等府作为考察对象。在清代, 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米粮交易中心, 但在行政建制上仅是镇一级, 属于汉阳府管辖, 因此本文用汉阳府的米价来代表汉口的米价。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乾隆六十年(1795), 重庆、长沙、汉口、苏州米价走势如图 1 所示。成都、南昌、安庆、杭州米价走势图 2 所示。

¹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长江流域粮价与市场整合研究”(15CJL038)。

作者简介: 罗畅, 经济学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经济史; 杨建庭, 历史学博士,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经济史; 马建华, 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后,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讲师, 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经济史。

全汉昇:《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9, 10(上), 第 63-103 页。收入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 第 345-398 页。

Carol Hua Shiue. 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9.

许檀先生将明清时期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在划分这三大层级时, 主要是关注该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而不是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第 1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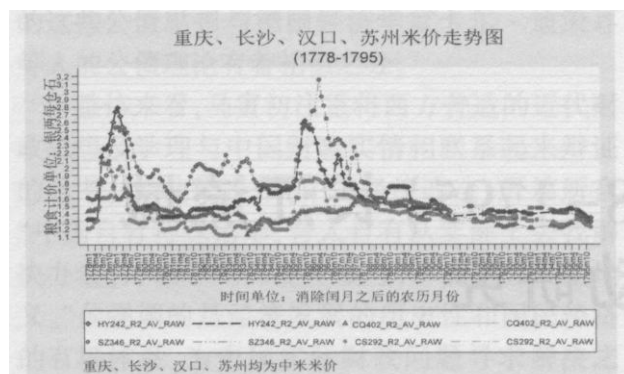


图1 重庆、长沙、汉口、苏州米价走势图(1778-1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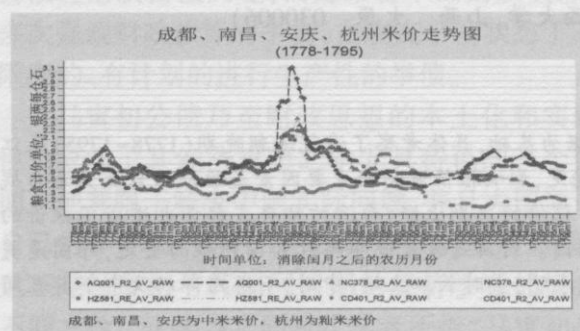


图2 成都、南昌、安庆、杭州米价走势图(1778-1795)

注:图1、图2中的AQ表示安庆,NC表示南昌,HZ表示杭州,CD表示成都,HY表示汉阳,CQ表示重庆,SZ表示苏州,CS表示长沙,242、402、346、292、001、378、581、408是王业键给这些地区的编码,RE表示籼米,R2表示中米,AV表示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平均值,RAW表示原始米价数据。

从图1、图2可以看出,乾隆四十三年(1778),长江流域米价急剧上升,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米价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乾隆五十年(1785),米价再度达到新的峰值,之后米价逐渐回落。乾隆晚期,米价较为平稳,呈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乾隆四十三年和乾隆五十年(1785)的米价异常值,都是由于受灾所致。

乾隆四十三年至乾隆四十四年的米价上涨,主要是因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特大旱灾所致。受灾最重的河南省毗邻长江流域,吸纳了长江流域的大量米谷,刺激了长江流域的米价上扬。且长江流域的产粮重要省份“安徽各属被灾较广”。湖南省部分地区亦受灾,长沙府府治长沙县“(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大旱,早、中二稻无收,蠲免地丁钱粮,赈恤饥民。四十四年己亥,虫食苗心,岁歉。四十五年庚子,自九月不雨,至次年三月,竹木皆枯,幸不伤稼”。湖南省部分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刺激了米价的上涨。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与江南同时受灾,亦推动了米价的上涨。“湖北今夏得雨稍迟,米价渐长。……江南向每仰给川楚之米,今岁亦间有偏灾。”该年湖北先是遭受旱灾,后又遭受水灾。“(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奉土谕:本年湖北汉阳等各府属先被旱灾,又因汉江盛涨被淹,灾分较重。”²所幸该年川西、川南粮食丰收。川米下运济楚,有力地缓解了湖北米价的上涨。

² [清] 彭元瑞:《孚惠全书》卷三十九·偏隅赈借十三,民国罗振玉石印本。

[清] 赵文在:《(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六·祥异,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清] 彭元瑞:《孚惠全书》卷五十二·截拨裕食六,民国罗振玉石印本。

[清] 彭元瑞:《孚惠全书》卷二十一·偏隅蠲缓十,民国罗振玉石印本。

面对此次由于大灾导致的米价上涨，湖广、四川的督抚均心存遏余，遭到朝廷的严厉斥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奉上谕：前据（湖广总督）三宝、（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湖北今夏得雨稍迟，米价渐长，遇有川米过境，催截运售’等语。此非遏余而何？……江南向每仰给川楚之米，今岁亦间有偏灾，更不能不待上游之接济。且楚米既不能贩运出境，若复将川米截住，不令估船运载，顺流而下，则江南何所取资？……随即传谕训饬：如川省米船到楚，听其或在该省发卖，或运赴江南通行贩售。总听商便，勿稍抑遏。嗣又据（四川总督）文绶因楚省有买川米之咨，奏称‘川西、川南虽获丰收，恐商贾纷集争余，或致米价腾踊，拟将水次州县各仓内，拨二三十万石，碾米运楚应用’等语。名为设法调剂，实欲藉此塞责，禁止商余也。……随即饬令：不必将仓谷碾米运楚，听商贩源源余用，夔关验放，不得稍有留难。……着传谕文绶：将拟拨楚省之仓谷二三十万石，即速就各水次碾米，运赴江南备用。……该督抚速为遵照妥办。该部即遵谕行。”

从这道上谕可以看出，乾隆四十三年灾情严重，四川虽然丰收，但面对长江中下游诸省的大量贩运，逐渐感到了米价上涨的压力。川楚督抚为了遏余，将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朝廷站在全局的角度来考虑民食问题，因此严禁遏余。

之后数年，长江流域米价较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粮食连年丰收所致。“（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长沙）大有年。四十九年甲辰，（长沙）有年。”由于江浙连续数年粮食丰收，运来的商贩米粮数量有所减少，导致依赖米粮税的苏州浒墅关税收随之下降。“（乾隆四十九年）江苏、浙江两省地方，岁收丰稔，粮价稍平。北来米货，不能畅销。”

从图1、图2可以看出，乾隆五十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长江流域各府米价均明显上涨。这是由于乾隆五十年的特大旱灾所致。

这次旱灾是乾隆朝最严重的一次，大旱造成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一些湖泊、河港断流。

长江中游的长沙县，在乾隆五十年“四月至七月不雨，民间掘井，车灌或以桶汲浇禾，得收获，米贵。”长江下游的苏杭，在乾隆五十年“江浙秋旱成灾，西湖浅涸。仁和（县）朱文藻《苦旱诗》自注云：今岁人梅以前，久不雨，西湖涸尽。”“（乾隆）五十年大旱，（苏州府）河港涸，蝗蝻生，岁大饥。”

时人钱泳详细记载了乾隆五十年大旱及民众的惨状。“乾隆乙巳，岁大旱。”“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饥民载道。”同年安徽宁国等“各府州属，俱大旱。”该年“浙江杭、嘉、湖三府属夏秋缺雨，粮价增昂。（朝廷）严饬川、楚等省毋许截留遏余，商贩得以流通。”粮食的自由流通对缓解江南的粮价上扬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这次旱灾是全国性的，故当时各府米价仍然普遍猛涨。“乾隆五十年，江南旱魃为虐，几至赤地千里，……两湖、山东、江西、浙江、河南俱旱。舟楫不通，贫民在在失业。米贵至四、五十文一升，肉价每斤一百五六十文。其他食物，或贵至二、三倍。以致死亡相望，白日抢夺。……此自康熙四十五年以来未有之奇荒也。是年太湖水涸。”³由于旱灾极为严重，导致太湖、西湖干涸，并导致由于缺水而造成粮食的运输成本上升。

乾隆五十年大旱所导致的灾情极为严重，令民众印象深刻。“东南……大旱，四十余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庆十九年，

³ [清] 彭元瑞：《孚惠全书》卷五十二·截拨裕食六，民国罗振玉石印本。

[清] 赵文在：《（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六·祥异，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乾隆五十年七月十一日苏州织造四德奏报浒墅关盈余短少实在情由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0352-010。

[清] 赵文在：《（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六·祥异，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民国] 李榕：《杭州府志》卷八十五·祥异四，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清]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三·祥异，清光绪九年刊本。

[清]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阴兵。

[清]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黑土。

[清] 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四十七·杂类志·祥异，清光绪四年刻本。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三日闽浙总督雅德、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闽省本年晚稻收成分数并粮价清单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02-011。

[清] 顾公燮：《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7-188页。

两见而已。”

从以上对这次旱灾的记录可以看出，此次旱灾极其严重，甚至是“四十余年之中”，仅“两见而已”中的一次。“饥民载道”，“太湖水涸”，百姓“死者日各有千人”，不得不“日以万计”的以土为食，导致乾隆五十年、乾隆五十一年长江流域的粮价飞涨。

从图 1、图 2 可以看出，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乾隆六十年（1785），长江流域的粮价总体较为平稳。其内因由于乾隆朝最后十年，长江流域粮食收成不错，国内政局也较为安定。

乾隆五十一年，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米价仍然处于峰值。这是由于上年旱灾及由旱灾导致的瘟疫，致使农作物歉收所致。江浙部分地区在乾隆五十一年继续遭灾，但灾情比上年已经缓解很多。苏州府“（乾隆）五十一年夏间，米价祟至每升四十余文。”由于上年遭受特大旱灾，导致苏州府“（乾隆）五十一年，大疫。”浙江嘉兴府嘉善县，“是年各路亢旱，籽粒无收，故米价腾涌，石值钱五千文。”江苏常州府靖江县，“秋大稔。是年春，斗米六百文。至秋，谷价骤减三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长江流域主要是春禾歉收，秋禾仍然收成良好。故到乾隆五十一年年底，米价又逐渐回落。

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流域各府米价迎来一个小高峰。这是由于该年长江流域的洪灾所致。乾隆五十三年是长江流域“水灾非常严重的一年，共有 124 个州县厅发生水灾。其中，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西、四川等省都出现了山洪暴发为灾的现象。”该年，湖北有 37 县被水，江西有 15 县被水，江苏有 18 县被水，安徽有 37 县被水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湖南辰州府溆浦县突发洪水。这次洪水造成“乡城冲塌瓦房共五千三百二十四间，……草房三千三百三十四间，……乡城淹毙大男妇三百七十二口，……小男女一百一十四口。”同月，安徽徽州府祁门县亦发生特大水灾，“溺死者六千余人。”六月，湖北荆州城墙被洪水冲垮，洪水入城。“共淹毙大小男妇一千三百六十余名口，坍塌瓦草房四万余间。”这三处水灾极为严重，导致灾区粮价剧增。

乾隆五十三年，长江流域各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安徽徽州……等府属各州县，田禾被水，致成偏灾；江西省南昌……等府属，秋禾被淹成灾；浙江省遂安……等四县因江水陡涨，猝被水灾；又湖北省荆州堤埝溃决，并武昌……等三十六州县江河泛涨，田地房屋多被淹浸；湖南溆浦、华容等州县被水成灾。”⁴

乾隆五十三年，广西也遭了灾。“因粤东省户口实繁，而（广）西省米谷贩运稀至。……（广东）委员采买江（西）、楚等省米石，均已到齐。”可见，江西、湖南等省虽然受灾，但仍然接济广东米谷，使得当地米价进一步上涨。同时，由于乾隆五十

⁴ [清] 包世臣：《庚辰杂箸二》，《小倦游阁集》卷九·正集九，清小倦游阁钞本。

[清] 章腾龙：《（嘉庆）贞丰拟乘》卷下·杂录。

[清]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三·祥异，清光绪九年刊本。

[清] 江峰青：《（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三十四·杂志上·祥异，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清] 叶滋森：《（光绪）靖江县志》卷八·授祥，清光绪五年刊本。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年，第 30 页。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年，第 436 页。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抚浦霖奏为溆浦县骤被水淹及亲往查勘缘由事，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1064-018。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湖南巡抚浦霖奏为勘明溆浦县被水情形及等办抚恤事，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1064-028。

[清] 周溶：《（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志·祥异，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徐凯希：《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大水及善后》，《历史档案》2006 年第 3 期，第 39-45 页。

[清] 彭元瑞：《孚惠全书》卷四十三·偏隅赈借十七，民国罗振玉石印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八第 1 条，盒号：709，册号：2。

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三年二月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台米不但不能运销东南沿海，长江流域还要向福建和台湾供应大批军粮，这也刺激了长江流域在此期间的粮价上涨。“（乾隆）五十二年，台湾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万（两白银），……又拨各省米一百十万（石），并本省米三十万石，加以运（费）、脚（价），约共银、米一千万（两白银）。

此后数年，长江流域被灾较少，粮价逐渐平减。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湖南省早稻业已登场，中稻现在刈获，晚稻渐次结实。”八月，四川“通省早、晚二禾收成，约计有九分以外。”湖南和四川的粮食丰收，为长江流域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有力地稳定了长江流域及相邻各省的粮价。十月，湖北“中晚二稻均已丰收。……荞麦已得稔收。”浙江“收成分数，通省计九分有余。”湖北、浙江丰收之后，湘米、川米的外销量减少，这对于稳定川省及湘省的粮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台湾“一厅三县，匀算收成确有八分。”六月“（福建）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岁庆屡丰。……漳（州）、泉（州）二府虽资台米，缘上年秋成及本年麦、禾俱获丰收，本境所产可敷民食，是以市价不致增贵。”^⑤福建各府连续两年丰收，特别是台湾府有大量余粮外运，减轻了福建在江浙购买粮食的数量，有利于长江流域粮价的稳定。八月，“屡年以来，湖南各属收成俱为丰稔。今年……收成较往年更为十分丰稔。”该年，台湾、福建、湖南均获得丰收，长江流域的米价因此较为平减。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湖南、（湖）北各统计，二麦八分有余。”江苏“大江以南，各属二麦、春花收成较早，均已刈获登场。……江北各属地气稍寒，现在二麦甫经收割。”十月，“浙江省秋成丰稔，……棉花、黄豆亦已一律丰收。”“（乾隆）五十六年辛亥，（长沙）大有年。”^⑥该年，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均获丰收，粮价较为平减。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江南“上江各属，早稻陆续登场；下江各属，秫秫已经刈割。”该年，江南的收成较为良好。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湖北通省除应山等六县不产早稻外，其余六十二州县，早稻均已收获登场。……楚北……比年屡丰告庆，本年二麦有秋。”九月，浙江杭州等“十一府，晚稻现已黄熟。”九月，台湾府“连岁收成丰稔。”该年，湖北，台湾等地又

^⑤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报广东本年五月份雨水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66-034。

〔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二·军需各数，清嘉庆湛胎堂刻本。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湖南巡抚浦霖奏报湖南本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得雨次数并六月份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70-020。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四川总督李世杰奏报四川本年七月份雨水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70-030。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九日湖北巡抚惠龄奏报湖北本年九月份得雨日期粮价并抚恤江陵等县灾黎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70-017。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浙江巡抚琅玕奏报浙江本年九月份雨水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70-013。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台湾镇总兵奎林、台湾道万钟杰奏报台湾本年早稻收成分数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11-002。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遵旨飭查台湾府属粮价复奏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11-001。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湖南学政张姚成奏为敬陈经过衡州等地方收成情形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10-028。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湖广总督毕沅奏为两湖各属麦秋告稔城乡景象颇形宽展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14-045。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护理江苏巡抚奇丰额奏为江苏省本年三月四月得雨情形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83-020。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浙江巡抚福崧奏报浙江九月以来晴雨粮价情形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14-011。

〔清〕赵文在：《（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六·祥异，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获丰收，由于连年丰收，长江流域的粮价较为平减。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川省七月以来，……各处田畴，无论高低，悉成大熟，……目下新谷登场。”该年，四川全省普获丰收，这为长江流域的粮价平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乾隆六十年三月，“粤、闽、楚、浙等省二麦渐已结实，转瞬丰收。”四月，“江(苏)省二麦渐次收割。”九月，“大江以南，……今岁麦多双歧，异常丰稔。”十二月，在总结该年的粮食收成时，湖南巡抚称“湖南省……连岁以来，年谷顺成，屡丰志庆。本年三稻稔收，俱获九分有余。”该年，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收成状况均很好，这促进了长江流域粮价的进一步平减。

从乾隆五十四年至乾隆六十年，长江流域及对长江流域需求粮食较多的闽粤地区普获丰收。其间，长江流域虽也曾遭受偏灾，但仅限一隅。这有力地保障了长江流域的粮食供应，使得粮价逐渐平减。

三、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的市场整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遭受灾荒时，官员奏报的粮价清单反映粮价普遍上涨，这表明乾隆朝后期粮价数据的可靠性较强。同时，长江流域存在着经常性的官府与民众均积极参与的粮食运销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用变异系数和相关系数的方法来具体衡量乾隆朝晚期长江流域的市场整合程度。⁶

相关系数可以衡量两地价格的相关程度。本文在使用相关系数时，有大量的定性史料作为支撑，这样能够尽量避免伪相关。

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九府中米米价的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江上游的成都、重庆和长江中游的长沙的米价最为低廉，其米价均值分别为 1.37、1.45 与 1.40；长江中游的汉阳、安庆、南昌的米价相对较高，分别为 1.69、1.68、1.64；长江下游的江宁、苏州、杭州的米价最高，分别为 1.63、1.87、1.73。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湖南在清代前期大量围湖造田，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加上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造成的人口外流，使得湖南的人口压力在清初并不大，因此有大量的粮食可供输出，故长沙在长江中游的米价最低。四川由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导致人少地多，在清朝前期的米价相当低廉，常年有大量的粮食输出。经过清朝前期百余年的开发，加上全国性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其粮价均值逐渐向长江中下游靠拢。

⁶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两江总督书麟奏报上下两江本年六月雨水田禾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M-01-25-0292-0140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毕沅奏为武昌等属甘霖应候优施秋田大稔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299-023。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吉庆奏报浙省本年八月份雨水田禾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301-023。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镇总兵事务哈当阿、福建台湾道杨廷理奏报台湾本年晚稻收成分数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22-022。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四川总督福康安奏报川省本年秋成分数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4-0078-042。

乾隆六十年三月初六日江西巡抚陈准奏报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份江西省地方雨水粮价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313-027。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江苏巡抚奇丰额奏报江苏本年二麦约收分数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3-0126-034。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一日徽瑞奏报江南地方秋禾木棉俱获丰收情形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5-0315-042。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湖南巡抚姜晟奏报本省各属十一月份雨水粮价情形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24-0078-0670

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 market 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88-94 页。

表 1 长江流域九府米价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1778-1795)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成都	1.3735	0.1277	0.09
重庆	1.4473	0.1611	0.11
汉阳	1.6853	0.3528	0.21
长沙	1.3974	0.2113	0.15
南昌	1.6365	0.2094	0.13
安庆	1.6769	0.3296	0.20
江宁	1.8244	0.4282	0.23
苏州	1.8831	0.3824	0.20
杭州	1.7251	0.181	0.10

注:数据来源同图 1、图 2,所有米价均为最低价与最高价的平均值。

长江中游的汉阳、安庆、南昌的米价相对较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区相对四川和湖南而言,经济要发达一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要更先进一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也相对更大一些。长江下游的江宁、苏州、杭州的米价最高,这是因为江南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市镇众多,人口稠密。江南地区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均居全国之冠,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的若干特征。⁷因此,江南地区的粮价亦居长江流域之冠。

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九府中米米价的相关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2 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九府中米米价的相关系数

	成都	重庆	汉阳	长沙	南昌	安庆	江宁	苏州	杭州
成都	1.00								
重庆	0.64	1.00							
汉阳	0.09	0.45	1.00						
长沙	0.09	0.48	0.83	1.00					
南昌	-0.12	0.22	0.66	0.76	1.00				
安庆	-0.28	-0.15	0.56	0.59	0.64	1.00			
江宁	0.09	0.22	0.79	0.69	0.69	0.76	1.00		
苏州	0.14	0.19	0.69	0.59	0.60	0.61	0.92	1.00	
杭州	-0.13	0.12	0.67	0.70	0.75	0.71	0.84	0.78	1.00

注:数据来源同表 1。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相关系数在 0.9 以上的只有江宁与苏州(0.92);在 0.8 与 0.9 之间的有江宁与杭州(0.84),汉阳与长沙(0.83);在 0.7 与 0.8 之间的有汉阳与江宁(0.79),苏州与杭州(0.78),安庆与江宁(0.76),南昌与

⁷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浙江学刊》2010 年第 4 期,第 15-25 页。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长沙（0.76），南昌与杭州（0.75），安庆与杭州（0.71）；在0.6与0.7之间的有长沙与江宁（0.69），南昌与江宁（0.69），汉阳与苏州（0.69），成都与重庆（0.64），南昌与安庆（0.64），安庆与苏州（0.61），南昌与苏州（0.60）。这表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内部已经分别形成了一个较为整合的市场，长江中下游流域也形成了一个较为整合的市场，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市场整合程度逊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长江中游紧邻长江下游，水运交通发达。长江上游的粮食顺流而下时，有很多就近在长江中游的汉口销售，再由汉口转销长江下游地区。这就更加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整合。

四、结语

本文利用王业键先生编制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乾隆晚期（1778-1795）长江流域九府中米价数据，分析了影响乾隆晚期长江流域米价波动的原因。乾隆晚期，清朝政局较为安定，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灾害与战争。特别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先旱后涝，乾隆五十年（1785）的大旱造成了粮价的急剧上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1788）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期间，台米不但不能运销东南沿海，长江流域还要向福建和台湾供应大批军粮，这刺激了长江流域在此期间的粮价上涨。

乾隆晚期的粮价稳中有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方面，乾隆晚期粮食屡获丰收，自然灾害较少，战争亦较少；外因方面，1776年至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追随法国，共同出兵对抗英国，英国对西班牙运往菲律宾的白银船只进行围堵；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造成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减少，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急剧降低。⁸

从长江流域九府的粮价均值可以看出，成都、重庆、长沙的米价最低，这与四川和湖南作为粮食输出大省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江南的粮价最高，这与江南经济的发达程度是一致的。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乾隆晚期，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整合的粮食市场。

⁸ 郭卫东：《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5-11页。